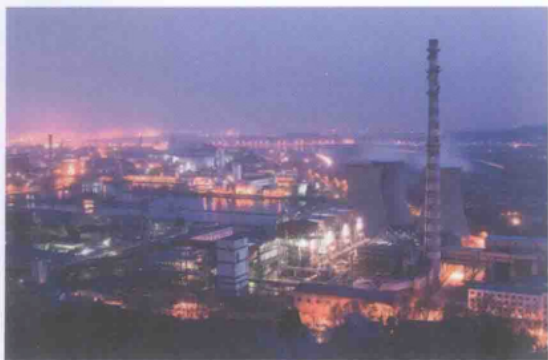


城市社会文化空间丛书 主编·周尚意

城市工业区社会文化空间的求变与求存

戴俊骋 周尚意·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城市社会文化空间丛书

周尚意 主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 41271152)

城市工业区社会文化 空间的求变与求存

戴俊骋 著
周尚意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南京·2016

内容提要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背景下,工业空间演替现象频出,这对城市社会文化空间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变化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如何去评价这种变化?这一系列的问题在人文地理学中尚未有结论。如何在“变”与“存”之间进行评价取舍,去寻找架接两者之间的桥梁,是研究的学科背景所在。本书从北京市工业空间宏观变化入手,结合中国乐谷、德胜科技园和首钢三个案例,将宏观结构与政府、企业、居民等多元主体的结构化动力进行综合探讨,提供了一套工业空间演替后评价社会文化空间变化的3S概念模型体系,旨在为工业演替区域发展和保护提供依据。

本书面向大学水平及以上的普通读者,特别是人文地理、区域经济、城市规划、旅游管理、文化宣传领域的从业者及相关专业师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工业区社会文化空间的求变与求存/戴俊骋,周尚意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6
(城市社会文化空间丛书/周尚意主编)
ISBN 978-7-5641-6419-5

I. ①城… II. ①戴…②周… III. ①工业区—城市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3742号

书 名: 城市工业区社会文化空间的求变与求存

著 者: 戴俊骋 周尚意

责任编辑: 孙惠玉 徐步政

编辑邮箱: 894456253@qq.com

文字编辑: 徐 潇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2号

邮编: 210096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出 版 人: 江建中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排版: 南京新翰博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张: 13 字数: 308 千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6419-5 定价: 39.00 元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发行热线: 025-83790519 83791830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前言

近年来,在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背景下,人们对工业空间的演替也日益关注。如何在发展与保护中找到平衡?如何在经济效益与文化遗产中寻求支点?这是研究者必须正视的问题。为此,研究者需要将工业空间的演替置于历史脉络之中进行拷问,探讨演替过程中的三大问题:究竟去留为何?演替的动力机制为何?演替的结果是好是坏?

本书在人文地理学经济与文化互动研究的学科背景下,立足于结构和结构化理论的演替动力框架,呼应多琳·梅西地方历史层累理论中关于经济要素与其他要素关系的探讨,采用访谈、问卷、统计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生计、制度关系和意识形态三个层次的工业文化以及工业空间的演替现象、动力机制和演替效果。并选取北京平谷东高村镇、西城普天德胜科技园区和石景山首钢的工作—生活区作为研究区域,三者区位和演替类型不同,因此具有典型性。

首先,本书从宏观尺度探讨了北京工业空间的演替格局,得到的结论是:第一,近30年,北京市产业结构逐步升级,第三产业比重持续增加;第二,北京市工业企业不断外迁,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成为现阶段工业企业集聚地;第三,北京市劳动力结构随之调整,城市发展新区成为劳动力主要增长区域;第四,北京市工业土地利用发生演替,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成为土地利用的主要替代类型。这里用马克思结构主义地理学可以解释宏观尺度下,城市土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演替机制。

在东高村镇案例中,生计层景观目前基本得以保留,作为生计层文化代表的提琴制作工艺,呈现出从形成到扩散再到转型的三个空间演替阶段。提琴生产工艺也在扩散过程中得到一定传承。同时,它的区域形象也从“提琴之乡”向“中国乐谷”不断升级。从演替的动力机制看,东高村镇作为平谷城区向南拓展的核心区域,对土地升值潜力的期望是工业空间演替的深层动力所在。但是政府、学校、企业和村民等各个主体也具有维护原来既有工艺,让工艺传承的结构化动力。从整个演替效果来看,技艺本身不构成地方性,因为承载技艺的主体很可能迁移。但是由多元主体介入且逐步形成的,具有根植性和隐性知识特征的知识传承创新系统,可以建构成地方性。并固化成为地方文化资本,这种资本会在一定程度上支撑当地提琴产品高端化,并支撑本地向“中国乐谷”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在普天德胜科技园案例中,原有的508厂除少部分改造为住宅区外,主体都改造为办公楼,形成了科技和创意企业集聚区。在演替过程中,主要是与通信相关类别的入驻企业,继承了包括政府通信管理部门以及老工业区中原有企业的社会网络。用地的演替动力来源于所在区域的土地升值压力,这是结构性的。从演替的评价结果来看,在原有工业空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网络对通信类企业有一定的吸引和促进作用。但与租金和税收的成本减免等因素相比,原有社会网络并没有成为吸引新企业入驻的主要因素。以工业设计产业为主的DRC园区内部新建立起来的企业网络能够促进位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创新。但是上述这种制度和社会网络的继承是借助产业类型延续,而非基于园区,不具有在地性特征。这种继承下来的制度和网络在北京甚至西城区的尺度范围内都具有类同性,没有使企业对园区产生黏性,容易造成企业追求更低运营成本而不断迁移的“大篷车”现象。

在首钢的案例中,具有综合价值的工业遗产被强制保留下来,构成地方人群共同记忆的依附点。在演替的过程中,原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首钢老工人及其亲属中有留存;首钢居民社会资本减少,对首钢社区的整体认同度下降。从表层结构动力分析,老工业区的演替过程很大程度上是重大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国家政策调整导致的,但从深层的结构动力来看,为降低环境成本而被迫进行搬迁,本质上也是资本追逐利润的结果。从结构化动力来看,集体主义文化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原因在于老工人群体习惯从原来的集体主义文化中,找到群体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但是外迁进入的居民、年轻工人以及新晋的创意工人群体并没有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浸淫,因此这种归属感并没有在这些群体中充分体现。从演替评价的结果来看,留存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对各种类型首钢工人企业文化的认同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而社会资本与首钢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呈现正相关关系。首钢在从“北京的首钢”迈向“世界的首钢”发展过程中,会通过留存的工业遗产以及老员工及其家属,留下一些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文化符号,但是当这代人过世或搬迁后,将无人可以真正解读这些符号背后的意义,不再具有对地方的共同记忆,那留下的很可能就只剩下物质景观标志了。

本书在三个案例的基础上提出:第一,生计层、制度关系层以及意识形态层文化在空间上都能留存。除了一些工业遗产外,这些社会文化大多以当地企业和居民作为载体呈现,一旦当这些留存文化的承载主体迁移或消逝的时候,这个地方很可能就剩下物质形态的工业景观,而新晋的企业或人群由于缺少对这些景观的共同记忆和认同,会导致工业空间演替后的地方性消弭。第二,从演替动力上看,资本逐利的结构动力是促成工业空间演替的核心驱动力,而结构化动力则是空间演替过程中文化留存的核心驱动力。本书认为空间演替实际上是在逐利的结构框架下,具有更强综合权力的行动主体在演替过程中行使其时空权力,并进一步塑造巩固这种权力,进而控制空间再生产的过程。第三,在对各个案例区评价时,本书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综合效益的可持续性入手,判断其是否可以形成良性的路径依赖锁定。并将案例区在演替过程中是否可以在尺度的升级过程中凸显地方的唯一性,作为另一个评价标准。并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包括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与尺度唯一性(Scale Speciality)两大指标的演替效益评价概念模型(可简称为3S模型)。

最后,本书针对三个问题,提出三大建议:首先,要注重工业空间演替过程中地方性塑造;其次,在工业空间演替过程中,重视并保障不同权力背景下行动主体群体路径选择的权力;最后,立足3S评价模型,提出要由内至外塑造地方竞争力。而文中关于演替留存、动力和结果评价的结果可以在其他案例区寻求进一步检验。

周尚意

2015年3月

目录

前言

1 工业空间演替之辩	1
1.1 现实之辩:发展与保护	1
1.2 理论之辩: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	2
1.3 工业空间演替之问	3
2 空间演替的刻画、动力和评价回溯	5
2.1 学科背景:地理学视角下的经济与文化互动	5
2.1.1 实体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的互动研究	5
2.1.2 经济地理学中的文化与经济	7
2.1.3 社会文化地理学中的经济与文化	9
2.2 空间演替刻画:工业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	11
2.2.1 空间演替及相关概念辨析	11
2.2.2 工业空间概念和演替刻画	12
2.2.3 社会文化空间概念和演替刻画	13
2.3 空间演替动力:结构与行动者	17
2.3.1 从“扑克牌游戏”谈起	17
2.3.2 结构主义	21
2.3.3 结构化理论	23
2.3.4 小结	26
2.4 空间演替评价:价值评价、经济评价与社会文化评价	26
2.4.1 空间演替的价值评价	26
2.4.2 空间演替的经济评价	27
2.4.3 空间演替的社会文化评价	30
3 北京工业空间演替的宏观格局及结构动力	34
3.1 近三十年北京市工业空间演替的宏观格局	34
3.1.1 产业结构升级	34
3.1.2 工业企业外迁	37
3.1.3 劳动力结构调整	42
3.1.4 工业土地利用变化	44
3.2 北京市工业空间演替的结构动力研究	48

3.2.1	表层结构动力	48
3.2.2	深层结构动力	50
3.3	北京市工业空间演替宏观背景下的中观样本选取	53
4	工业空间演替与生计层社会文化空间的互动——以北京远郊东高村镇为例	55
4.1	东高村镇介绍和研究方法	55
4.1.1	案例区介绍	55
4.1.2	研究方法	57
4.2	东高村镇工业空间演替:从“提琴之乡”到“中国乐谷”	58
4.2.1	形成期(1988—1999 年)	58
4.2.2	成长期(2000—2009 年)	59
4.2.3	转型期(2010 年至今)	60
4.2.4	小结	62
4.3	东高村镇提琴技艺演替分析	63
4.3.1	技艺形成期(1988—1999 年)	63
4.3.2	技艺扩散期(2000—2009 年)	64
4.3.3	技艺转型期(2010 年至今)	65
4.3.4	小结	66
4.4	东高村镇演替动力分析	67
4.4.1	政府为多元化的乐谷文化造势	67
4.4.2	规划师的思路转变	68
4.4.3	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博弈	70
4.4.4	熟人社会下的村民选择	73
4.4.5	东高村镇演替动力的结构和结构化分析	76
4.5	东高村镇演替评价:产业和区域升级与技艺传承系统	77
4.5.1	乐器制作产业的升级:从薄利多销到高端取胜	77
4.5.2	“中国乐谷”的可持续发展路径锁定:产业集群抑或音乐景象	77
4.5.3	东高村镇地方性的形成:区域提琴生产工艺学习系统的构建	79
4.6	本章小结	80
5	工业空间演替与制度关系层社会文化空间的互动——以北京内城普天德胜园区为例	82
5.1	普天德胜科技园介绍和研究方法	82
5.1.1	案例区介绍	82
5.1.2	研究方法	83
5.2	普天德胜园区工业空间演替:从电话设备厂到 DRC 的演替	88
5.2.1	2002 年之前的 508 电话设备厂	88

5.2.2	2002 年以后的“德胜普天科技孵化器”	90
5.2.3	2005 年开始建设的“DRC”	92
5.2.4	小结	94
5.3	普天德胜科技园社会网络演替分析	94
5.3.1	园区整体企业网络演替分析	95
5.3.2	普天德胜科技孵化器企业网络分析	97
5.3.3	DRC 园区企业网络分析	100
5.4	普天德胜科技园演替动力分析	105
5.4.1	普天德胜科技园演替动力的结构分析	105
5.4.2	普天德胜科技园演替动力的结构化分析	106
5.5	普天德胜科技园演替评价	106
5.5.1	既有的制度关系网络与园区对新企业的吸引力	106
5.5.2	制度关系网络对园区入驻企业的创新影响	112
5.5.3	继承下来的制度关系网络与园区的地方性	114
5.6	本章小结	115
6	工业空间演替与意识形态层社会文化空间的互动——以北京近郊首钢为例	117
6.1	首钢介绍和研究方法	117
6.1.1	案例区介绍	117
6.1.2	研究方法	118
6.2	首钢工业空间演替:从首钢工厂到工业遗产	123
6.2.1	首钢重大历史发展进程	123
6.2.2	首钢工业遗存景观分析	125
6.3	首钢不同群体意识形态层文化的演替分析	129
6.3.1	首钢企业文化的整体演替分析	130
6.3.2	首钢工人集体主义文化演替分析	132
6.3.3	首钢居民社会资本的演替分析	140
6.4	首钢演替动力分析	146
6.4.1	首钢演替动力的结构分析	146
6.4.2	首钢演替动力的结构化分析	147
6.5	首钢演替评价	148
6.5.1	集体主义价值观传承对首钢工人企业文化认同评价	148
6.5.2	社会资本对首钢居民生活满意度影响评价	151
6.5.3	演替过程中首钢社会文化的变与不变	151
6.6	本章小结	154
7	工业空间演替与社会文化空间的互动模式与展望	156

7.1 北京工业空间演替后的社会文化空间留存	156
7.2 工业空间演替与社会文化空间互动模式总结	157
7.2.1 演替留存——基于地方性的思考	157
7.2.2 演替动力——不同时空权力属性的主体路径选择	159
7.2.3 演替评价——基于可持续性与尺度唯一性的 3S 评价模型	160
7.3 工业空间演替的建议与讨论	162
7.3.1 建议	162
7.3.2 讨论	163
附录.....	164
参考文献.....	183
图片来源.....	193
表格来源.....	195
后记.....	196

1 工业空间演替之辩

“保存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能真切了解那里有什么,什么重要和为什么重要,以及它今天的存在和过去的联系。”

——英国工业考古学者克拉克(Clark et al., 2004)

1.1 现实之辩:发展与保护

中国正处在快速发展的转型期,各个城市的实体空间都发生着巨大变化。在国家提出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型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带来众多传统制造业基地的结构性衰落。以北京为代表的大都市,开始面临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同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中心城区资源密度急剧增加,导致要素成本显著上升,产业发展环境趋于严峻,主要表现为环境约束力增加、土地与房屋使用成本和交通出行成本等明显上升,以及工作环境拥挤和嘈杂等。这些因素都导致城区现有工业空间布局产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首都核心功能调整背景下,“四个中心”建设倒逼北京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市内传统工业空间在制造业外迁后,有的被完全替代为居民或商业区,保留下的工业空间也逐渐被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等替代,有的则成为工业遗产,工业空间表现出“演替”的现象。伴随着这种工业空间的演替,附着在空间上的社会也随之变化,即有的社会文化空间被更新,有的被保留,有的甚至被破坏。在工业空间发展演替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与社会文化空间保护之间的关系,是本书的着眼点所在。

随着城市中心城区的工厂纷纷外迁,大量工业用地被置换出来,城市郊区迎接新工业转移,一些产能低下的工业则被迁到更远的地方去。这些工业空间,有的被新兴产业所演替;有的变成了创意产业的集聚区,典型的如北京 798 艺术区;有的则完全被商业区或者居住区所替代。对于这些工业空间究竟该如何进行规划?这是一个现阶段规划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书试图提供一个可参考的路径。

现阶段关于工业空间的规划,本质上是工业遗产的开发和保护问题。许多国家针对工业外迁后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已经探索出不同的道路。最典型的如德国工业遗产的案例,保护的不仅仅是工业机器、生产设备、厂房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更强调的是抽象的文化遗产和蕴藏其中的人文内涵。他们认为工业在其发展历史中,不仅被当作是纯粹的技术事实,更是城市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刘会远等,2007)。近年来,我国一些大城市也开始重视工业遗产的价值,对工业建筑等不再是一味地拆除而是开始对其进行保护与更新。但是这种保护也往往着眼于短期经济效益的获取,缺乏对叠加于工业空间之上的社会文化空间的关注,更缺少与社会文化空间密切相关的地方性的挖掘与传承。

本书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试图从适合中国的现实背景出发,从北京的现象着手进行分析。一方面尝试为工业空间演替后可能出现的产业“空心化”提出建议,并寻求区域新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也为城市社会文化保护和氛围培育提供依据,在挖掘工业空间演替过程不同主体诉求的同时,构建度量社会文化空间变化的评价体系,从而为工业演替的区域进行相应的总体规划、产业规划和社会文化规划等提供重要参考。

1.2 理论之辩：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

约翰斯顿在《哲学与人文地理学》提到，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一横一纵”。其中，“一横”指的是人文事物的空间分布，“一纵”指的是人文事物与自然环境之间，不同层次文化之间的纵向关系(约翰斯顿等,2000)。由于欧美地理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属性，欧美地理学家对城市实体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的相互关系探讨不够，近年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趋势更侧重研究“一横”的关系。因此，对实体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探讨不够。而在中国，现代地理学一向被列为自然科学，因此就地理学研究本身也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周尚意等,2003)。

在人文地理学学科背景下，经济地理学与社会文化地理学作为两大主要的分支学科，也逐渐出现交融。20世纪90年代，经济地理学出现“文化转向”(Barnes, 2001)，而社会文化地理学中对经济的关注已经成为两个分支学科新时期研究的重点所在。本书尝试从工业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互动的角度，将这两个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联系在一起。从两大分支学科关注的重点来看，经济地理学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求“变”，而社会文化地理学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求“存”，在“变”与“存”之间如何进行评价取舍，如何寻找到架接两者之间的桥梁，是本书研究的学科背景所在(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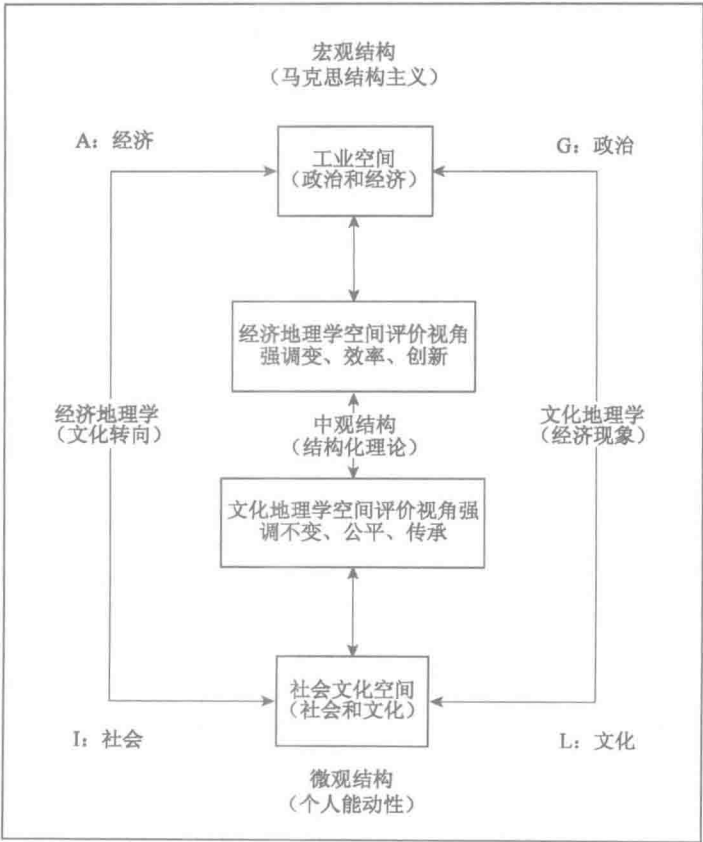


图 1-1 社会文化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学科关系图

在城市工业空间演替的过程中,社会文化空间是否具有稳定性?这是一个尚未被证实的问题。城市作为一种实体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的交互存在,表现为典型意义上的经济与文化要素的集聚。一个充分发展的城市社会空间,既能够成为城市人创造新生活方式的动力,又能够在改变社会关系的同时,形塑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张鸿雁,2005)。然而在中国社会转型期背景下,以工业生产制造为主要功能的工业空间发生了剧烈变化,出现了工业整体外迁或“腾笼换鸟”的工业与服务业产业置换的情况,工业空间发生了演替。这种工业空间的变化,是否带来城市社会文化空间的变化?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变化背后的机制是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在人文地理学中尚未有结论。

现阶段对工业空间演替的关注,更多集中于演替过程中“变”的部分,即究竟哪些变量发生了变化,但是除了在工业机器、设备、厂房等实体空间层面探讨“留”的问题外,究竟还有哪些不可见的社会文化空间得到保留?这是本书在理论方面的第一层面意义。

在分析社会空间的“变”与“留”以及这种变与留给地方经济和社会发生何种变化的同时,需要挖掘这种空间互动背后的动力机制问题。在现有马克思结构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社会文化空间演替的动力机制往往被解释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简单决定关系,社会文化空间的变化被视为由经济因素单一所决定。一方面,包括社会、文化、政治等一系列其他因素并没有考虑;另一方面,在某种结构下,包括政府、企业、居民以及各种代理组织,其作为行动者的动力被忽视,这种动力是否有可能构成社会文化空间变化的其他内在的稳定性动力?这是本书第二层理论意义,涉及工业空间演替与社会文化空间互动的动力机制问题。

在工业空间演替过程中,无论是“变”还是“留”,其价值判断往往容易单一地指向经济的价值取向,即使留下来的工业遗产,往往被指向经济开发用途或者成为新的企业载体,而忽略了工业遗产与过去在情感和认同上的联系(Benito Del Pozo et al., 2012),并没有考虑到社会空间中保留下来的一些社会文化特征是否有可能构成该区域的地方性内核。城市每个地区的地方性是在长期的历史时期中不断建构的。一个地方具有稳定的可以传承的地方性,那么说明该地方性具有一个有价值的内核。保持这样的地方性才可以促进本地和外地人对此地区的文化认同,而这些往往是这个区域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根本所在。这是本书第三层理论意义,涉及社会文化空间的评价问题。

1.3 工业空间演替之问

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将工业空间的变化视为一种社会的变化过程,认为工业的重振过程就是一个重塑社会关系的过程。她以英国工业为例,认为“当地经济结构可以视为一种‘层(layer)’积累的产品,每一轮投资都可以视为一种新层的叠加,在国际和国家劳动分工视角上,当新投资和不同的经济结构基础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地方”(Massey, 1983)。本书在此理论基础上,将工业空间的演替过程视为一个层累的过程。德里克·格里高利(Derek Gregory)认为,梅西的这个层累理论是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基础上用马克思结构主义地理学观点讨论了不同层之间由资本投入与经济结构组成的叠加关系,但是却对每个层内经济与其他要素(other strata)的接合关系所言甚少(Gregory, 1989)。这也就是本书要探讨解决的核心问题。如果将每个工业空间的演

替过程视为一个层,那么该层内空间上承载的社会文化与经济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简单地说,本书要解决的是在工业空间演替背景下,社会文化空间“变什么,留什么?为什么变?变得怎么样?”三个层次的问题。具体而言,要回答的是工业空间在演替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工业空间演替,是不是能留下东西?都留下哪些东西?留下这些东西是好还是不好?谁来判断?判断留与不留的依据和标准又是什么?展开来看包括:

第一,工业空间演替带来的社会文化空间有什么变化?着重分析社会文化空间有哪些不变的地方(也可称之为“留”下的东西)?这些不变的地方是否构成这个地方的地方性(因为如果一直在变,没有不变的东西,那么地方的地方性就无法形成)?故本书从文化地理学视角对工业空间发生演替后的社会文化空间进行刻画、分析和评价,重点关注演替后留存不变的部分,并探讨其能否构成地方性的问题,与以往偏重于对工业空间演替后接续产业的选择或工业遗产的分析视角有很大不同。

第二,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这是尝试回答演替的动力机制问题。究竟哪些因素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起作用,哪些主体又参与到整个变化过程中,并对这种变化和去留产生了影响?对此,本书尝试用结构主义和结构化理论相结合的方式探讨空间演替的动力机制问题,重点分析不同主体社会文化留存的结构化动力所在。

第三,如何评价社会文化空间的变化,涉及工业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的互动关系问题?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互动关系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否有促进作用?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工业空间演替后,地方性是否变化(削弱还是增强)?对地方文化的传承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针对于此,本书对工业空间发生演替后社会文化空间评价,是本书的创新点也是难点所在,以期改进过去空间评价过程中单纯将效益转化为货币度量的评价模式。

2 空间演替的刻画、动力和评价回溯

本书要探讨的是工业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演替过程中的互动关系,涉及对两大空间演替的刻画描述、对空间演替的动力探讨以及价值评价三大方面问题。故本章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背景出发,探讨经济地理学中的社会文化和社会文化地理学中的经济,借此剖析人文地理学,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几大转向背景下,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同时,对工业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的刻画描述,演替的结构与行动者动力,以及演替的经济、文化价值三大方面理论进行探讨。整体理论框架如图 2-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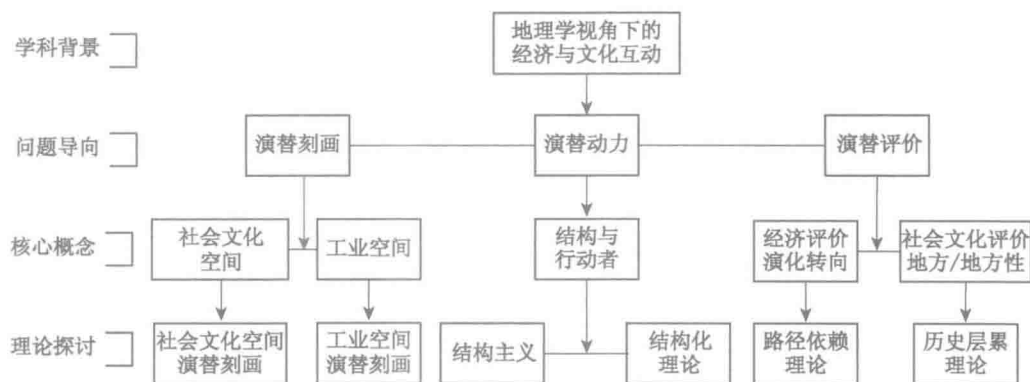


图 2-1 本书概念和理论框架图

2.1 学科背景:地理学视角下的经济与文化互动

本书研究的主题是工业空间演替与社会文化空间的互动关系研究,本质上是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尽管现阶段区域发展过程中对区域社会文化建设逐渐重视,但是“经济挂帅”的现象依旧十分普遍。纵观人文地理学学科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人文地理学开始呈现出多元的哲学思潮,以经济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为代表,文化在两者的关系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重新来审视地理学视角下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2.1.1 实体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的互动研究

人地关系研究是地理学四大研究传统之一(Pattison, 1990)。在人地关系系统中,主要包含“人”和“地”两个方面。“人”兼有自然和社会两种属性,是环境的参与者和改造者。随着生产力、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人开始脱离劳动、生产和自然。当产品成为主要的交换对象的时候,原始的自然环境或者称之为“第一自然”就从第二自然中分离出来。“第二自然”由社会生产出来,而“第一自然”不是“第二自然”的剩余物,而是“作为附属品,在普遍化的第二自然中产生并复制出来”。城市是“自然”被改造的结果。城市原始的自然环境为“第一自然”,而城市的道路、建筑、人造植被等是“第二自然”(Gregory, 1994)。

因此,城市的第二自然空间又被学者们称为城市的“实体空间”。人们生活在“第二自然”中,塑造着城市的“第二自然”,同时受到“第二自然”的影响(Gregory, 1994)。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文化地理学的学者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认为城市除了“第二自然”外,还存在社会文化空间。两位新文化地理学代表人物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和杰克森(Peter Jackson)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文化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媒介,人们通过这种媒介把物质世界的平凡现象转变成由这些现象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一些重要象征所组成的世界。”(Cosgrove et al., 1987)更具体地说,美国地理学家罗伯特·莫迪(Robert Murdie)指出,城市的空间模型还应包括民族、家庭、经济在内的三个社会文化空间层(Murdie, 1968)。因此在研究人与“第二自然”的基础上,进而探讨第二自然与社会文化空间的整合关系。

在现有对实体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关系的互动关系研究中,文化生态学家欧·奥尔特曼(I. Altman)和马·切默斯(M. Chermers)在《文化与环境》一书中,将这种互动关系划分为“强”式文化生态关系和“弱”式文化生态关系(奥尔特曼等, 1991)。“强”式文化生态关系强调环境占主导地位,环境以单向因果关系的过程强有力地决定着文化,环境对文化的作用是因果直链型关系,即 $A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C \cdots$; 另一种关系是J. W. 贝里所称的“弱”式文化生态关系说,直接关注于文化与环境两个变因的相互关系,而较少关心如何去建立严格的因果关系。它们的关系式表现为 $A \rightarrow B, A \rightarrow C, B \rightarrow C \cdots$ (奥尔特曼等, 1991)。这种关系则或多或少带有人文地理学中“或然论”的影子。而国内也已经有学者对城市实体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的互动关系作了研究,归纳出四种互动模式(周尚意, 2009),即 P_0C_0 模式、 P_0C_1 模式、 P_1C_0 模式、 P_1C_1 模式。 P_0C_0 模式代表的是实体空间没有发生变化,社会文化空间也没有发生变化; P_0C_1 模式代表的是实体空间没有发生变化,而社会文化空间却发生了变化; P_1C_0 模式表示实体空间发生了变化,而社会文化空间没有发生变化; P_1C_1 模式表示两种空间都发生了变化,并用相关的典型区案例进行支撑。鉴于现阶段城市工业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已经相互渗透,已经表现出所谓的“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的趋势(Lash, 1994)。在本书中,重点研究的是第四种模式 P_1C_1 ,侧重于分析工业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在演替过程中的互动作用。

一般认为一个地区社会文化发展了,地区经济才能进一步发展,即两个空间呈现出某种正相关的关系。如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对东西方诸宗教的比较研究中,提出新教精神是推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的主要精神支柱(马克斯·韦伯, 1987)。到了以哈耶克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时期,更是认为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决定了经济绩效,其中这种意识形态在诺斯看来是一种“主观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现为社会文化空间,是影响经济绩效的个人选择的关键,个人如何看待游戏规则公平与公正明显会影响绩效(詹姆斯, 2000)。

但是这种互动关系未必都是有益的,如蒙特(I. Munt)和威廉姆斯(M. Williams)两人的研究发现城市实体空间的发展影响到城市文化空间的变化,而且产生许多负面结果(Munt, 1987; Williams, 1987)。他们认为在变化过程中忽略了参与人群的“需求”,虽然考虑到他们的经济和文化偏好,却没有将其置于更大尺度的经济文化背景下考虑。

城市工业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按照空间使用类型进行划分下,从事工业生产及相关活动的实体空间,可以说工业空间相对于居住空间、商业空间,其经济属性更强,因

此,要研究城市工业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的互动关系,还需要得益于经济地理学家和社会文化地理学家的共同参与。经济地理学家发现,城市经济空间格局背后的动因,除了经济动力外,还有文化的动力。因此,在诠释经济、社会空间格局的形成原因时,离不开“文化”的解释(Barnes, 2001)。以下就从经济地理和社会文化地理两个领域审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2.1.2 经济地理学中的文化与经济

1) 文化从属于经济

传统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可以被视为符号中心主义(logocentrism)(Gibson-Graham, 2000),一方面将两者的边界界定地非常绝对;另一方面就是将其界定为另一个词的反义词。形式上,是A和非A的区别。打个比方,如果经济是硬的,文化就是软的;如果经济是关于事实的,文化就是关于价值的;如果经济是强的、可控的、男性化的,文化就是弱的、从属的、女性化的。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来自于对经济地理学影响最深的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经济地理学受古典经济学框架影响最深的是1955年到1975年之间的“计量革命”,最典型的代表是哈哥特的区位分析,如在牛顿重力公式下的模型推导,还有杜能同心圆、韦伯工业区位三角、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等。这些模型都假定行为人之空间互动为“统一的理性行为”(Sheppard, 1978),这时候文化都是被置之一旁的。古典经济学中将文化从经济活动中排除有两种途径:第一,是在方法论层面将学科研究主体定义为理性的经济人。但事实上,甚至连经济学家自己都认识到这个假设的局限性,毕竟参与这些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互惠的社会共同体。第二,古典经济学采用模型形式的推理和分析过程,使得文化挖掘被摒除。当然,现阶段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空间经济学者依然坚持这样的研究路径,他抨击现阶段那些回避模型的经济地理学家,认为所谓的“后福特主义,尤其是德里达影响下的管治学派,是经济地理学的破坏主义者”(Krugman, 1995)。只是在这样的框架下,文化显然难以被简单地模型化。

当区位分析逐渐衰退的时候,正是政治经济学逐渐兴起之时(Johnston, 1991),尽管如此,经济与文化的基本分界依然存在,经济和文化被明显地分开,并且经济统治着文化。最典型的代表是马克思,他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基础,这其中上层建筑包括一系列社会、政治 and 知识过程”。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经常被解释为经济决定主义。另一方面,文化被视为一种附属现象。在这种观点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化和古典经济学的文化是有差异的,前者的文化是起作用的,用来维持资本主义的运行;而后的文化则不起到任何作用。但是两者显然都将经济优先化和中心化,将其作为物质生产力和个人理性选择的核心。受此影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也开始逐步吸收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观点。这主要是由哈维提出并进行系统化阐释的,他的核心观点是推动地理变化的关键在于区域内生产要素的积累刺激了剩余价值的最大化(Harvey, 1982)。遗憾的是,文化在其中鲜有提及,直到1989年哈维在著作《后现代的条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中,将其副标题拟为“文化变化的质询”(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逐渐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中寻找答案(Harvey, 1989)。他认为现代主义文化是基于福特制经济,而后现代文化则与后福特经济关系一一对应。各种文化对应的经济形式,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减少大萧条增加剩余价

值的资本主义积累。即使到了2000年的《希望空间》(*Space of Hope*),哈维依然在宣扬这种经济与文化的二元论思想(Harvey, 2000)。一方面,认为“文化分析”是“有趣的”;另一方面,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这个忧郁的世界和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破碎现实”(Harvey, 2000)。在这场一点儿都不有趣并且有点现实的讨论中,包括“市场拜物教”、“瘦身的野蛮历史”、“科技变化”、“弱化的组织劳动力”以及“产业后备军”,唯独少了文化分析。但是哈维终究是孤军奋战者,而即使是迪克·皮特(Dick Peet)也开始寻求“经济的文化源泉”,运用文化的术语,包括“符号、图景……”(Peet, 2000)。他还说“从没想过,政治经济学有一天会变成文化经济学”。同样的,内尔·史密斯(Neil Smith)作为哈维的学生,认为简单地回归到阶层分析是自我防御的“死路一条”(Smith, 2000),“必须去寻找关于阶层的认同和文化政治学”(Smith, 2000)。

2) 文化转向

当代经济地理学中开始对文化的重视,源于越来越多的从左翼激进的观点开始关注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从传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基础关系转向更为复杂的文化、性别、种族和宗教等等。文化和经济之间的边界开始变得越来越没有那么鲜明,这其中受文化研究的影响较大,主要包括两大流派:第一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包括莱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该学派的核心在于从社会主义政治意图出发来纠正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它的新颖之处在于,在保留阶级分析和经济分析基础上,同时认识并合并文化研究中有关价值观、生活方式、情感和政治承诺等原本处于研究边缘的东西(Smith, 2001)。另外一个学派是北美学派,更多的是受后结构主义影响,在北美学派中文化往往被称为“免费的文本、再现和话语的关系”(Gibson-Graham, 2000)。

到了20世纪末,经济地理学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和“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 turn),这两个转向都强调在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过程时,须将文化和制度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周尚意, 2011; Gibson-Graham, 2000)。奈杰尔·斯里夫特(Nigel Thrift)甚至认为“经济地理学家已经成为文化地理学中的一些核心部分”(Thrift, 2000)。在迈克·克朗(Mike Crang)和斯里夫特总结的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的评论中,认为当今经济与文化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五大领域(Crang, 1997; Thrift, 2000):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的。通常引用后结构和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强调以身体为中心的工作文化表现与展开工作的场所和空间以及物质结果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二个是高技术的发展和利用。强调制度根植性以及要求邻近性、隐形知识和共享文化所假定的那些密切个人交往的重要性。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没有独特的生产文化,学习区、高技术中心和关系网络等地理现象就不会出现;生产文化是其一部分。第三个是以金融部分和商务咨询为代表的信息服务部门,这些经济活动需要高度的个人相互作用和解释技巧,研究主要集中在相互作用的那些人的文化和相互作用的场所,以及用于解释的符号和话语策略。第四个是企业,强调各种怀疑甚至是矛盾的话语,他们形成高水平的管理文化并且反过来影响企业进程。第五个是消费领域,消费者不再是最大化的理性人模型,关注对商品消费本质认识中的文化敏感性、消费动机以及销售场所。

巴恩斯(Trevor Barnes)则在他关于经济地理学经济与文化的综述性文章中,提出了“混合地理学(hybridgeographies)”的概念,他提出混合地理学有以下几个基本原则:第